

宋庆龄战斗在武汉

邓涛 苏典清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革命的高潮。

1926年12月10日，时年33岁的宋庆龄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由九江到达武昌，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革命斗争。

每天都在汉口南洋大楼办公

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以前，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还有鲍罗廷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此后，宋庆龄每天都会到“临时联席会议”的所在地汉口南洋大楼办公。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执行职权。当天12时，宋庆龄在南湖和徐谦、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起，出席了逾20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元旦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人民阅兵典礼。1月初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宋庆龄、孙科、陈友仁、邓演达、董必武、李宗仁等13人被任命为委员。

1927年1月20日，宋庆龄为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发表《敬告全国女同胞书》，强调妇女要获得自己的权利，“是要自己奋斗来做代价的，指望别人恩惠靠不住”。她呼吁：“有志的女同胞，可以自由前来受训练。”

2月12日上午在汉口四唯路，中国国民党妇女政治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该班的班主任宋庆龄发表了演讲《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称妇女“在社会上的责任，不仅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同时要为国家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孙)总理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



1927年宋庆龄在武汉留影

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妻良母，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共产党人恽代英、张太雷等被称为这个班的教员。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33人。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谭延闿、徐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于树德等18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等11人，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等4人。全会历时7天，于17日结束。

在此次全会上，经过宋庆龄和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全会强调：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务必采取措施限制蒋介石的独裁，实际上罢免了蒋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挫败了他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3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新增加五个部，任命宋庆龄为卫生部部长。

发表通电揭露蒋汪的叛变行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乃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次日，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邓

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通电指出：一切革命分子皆被帝国主义的工头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通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盗贼。

武汉等地自此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5月，在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室里，宋庆龄多次当面规劝汪精卫不要违背孙中山遗训，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国民党右派对宋庆龄为忌恨，始则施展阴谋诡计，制造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继则进行武力威胁。何键的三十五军胆大妄为，昼夜监视宋庆龄的行动，竟然搜查了她的住所。是月中旬，北伐军的前线伤兵陆续运到武汉，集中在汉的伤员已近万人。

6月8日，宋庆龄和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伤兵救护会，从事救护伤兵以支援北伐战争；25日宋庆龄致电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请求募捐款项救济武汉伤兵。后该会决定捐款3万卢布，并拟发动各工联团体捐款。在宋庆龄的积极努力和组织领导之下，救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冯玉祥将军代表国民党官兵致电宋庆龄，表示感谢。

7月12日，宋庆龄接蒋介石函，要求她“即日回沪”，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想借其威望以助其反革命的声势。她当即予以拒绝。14日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同共产党决裂，

公开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封建的革命纲领。宋庆龄断然拒绝参加他们秘密召开的“分共”会议，委托陈友仁代表发言坚决反对“分共”。

中国共产党人“亲密的战友”

7月14日，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指出：“本党基于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在声明中宋庆龄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强调必须依靠工农阶级，把工农视为“力量的基础”“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热情地支持工农运动，坚决赞成土地革命，明确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声明对革命的前途仍充满着信心，郑重指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路……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下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

这篇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声明，剥开了那些伪装成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背叛者的“画皮”，向世人展示了她钢铁般的意志。

7月17日深夜，宋庆龄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生活、战斗了7个多月的武汉，取道上海前往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罪行，投入新的战斗。在武汉革命政府时期，宋庆龄为实施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艰辛努力。宋庆龄十分珍惜苏联人民的宝贵友谊，她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亦和孙中山同感，要救活国民党“就需要新血液”，因此宋庆龄同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团结无间，这位“伟大的战士”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亲密的战友”。

1927年8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邓颖超、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屈武等共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郑重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而奋斗到底”；提出七项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要继续反帝和解决土地问题。号召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国民党新军阀和国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等的一切势力。

(作者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人逸事

陈独秀谈鲁迅

崔鹤同

一次，陈独秀和他的表弟濮清泉谈起鲁迅。

陈独秀说，首先必须承认，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名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也欢迎他的二弟周建人写稿，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人是喽啰，微不足道。言论自由，我极端赞成，不过对一个人的过誉或过毁，都不是忠于历史的姿态。

陈独秀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他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

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的下场)。濮清泉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他焦大，他就贬低鲁迅呢?

陈独秀说，我绝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绝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绝不是战斗，我很佩服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为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愧之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陈独秀对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发自内心的。

赵元任“痛骂”刘半农

刘建东

“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他还曾跑到刘半农家里，用各种方言把刘半农“痛骂”了一通。

赵元任和刘半农不仅是老乡，还是语言、音律合作上的好友。1925年秋天，刘半农从法国留学结束，在返回中国的海轮上，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诗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当时，尚在美国旅居的赵元任看到了这首诗，顿时被诗句的意境感动了，随即作了谱曲，歌曲风靡全国。这首歌也成为20世纪中华音乐经典，至今备受推崇、经久不衰。

在刘半农去世之前，他所作的大部分歌词都由赵元任谱曲，然后公开传唱，可见这两位老乡的情谊之深。

而刘半农对各方方言很有研究，他先后记录了70多处方言。一天，他突然奇想，打算编一本“骂人

精粹”，录入各地方的骂人话。就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公开征求各地北京方言。并表示：骂不还口，多多益善。

赵元任见到启事后，甘做第一个吃螃蟹之人，酝酿一番，气势汹汹来到刘半农家里，指着好友的鼻子，用湖南、四川和安徽等地的方言“痛骂”了一顿，据说骂了两个小时。

刘半农在报纸上的征求仅限于中文骂人话，否则，依赵元任的外语水平，很可能用带有柏林口音的德语、用带有巴黎郊区方言的法语一起脱口而出，对着刘半农“恶骂”一通。

赵元任把刘半农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说，刘半农半点不敢还嘴，只得一边听一边做笔记。这大概是赵元任一生中，唯一一次酣畅淋漓运用各种方言痛骂别人。

多年后，赵元任在追忆刘半农的茶话会上，回忆说：“当时骂完了人，仿佛找到了乐子，好像打了胜仗一样，昂首挺胸离开了刘教授的住所。”

费孝通读《史记》

陈浩

费孝通自小博览群书，后来又教书、写书，可以说一生与书相伴，是个真真切切的“读书种子”了。

以读《史记》为例，费孝通曾分享自己有三大体。

一是读自己喜欢的书。年轻时，费孝通跟着老先生读《史记》，从枯燥的圈点开始，但他读得津津有味。老先生问：“你觉得怎么样？”费孝通说：“我很喜欢读。太史公把古人写活了。”读书难，贵在坚持；读书也易，读自己喜欢的书，也就不觉得单调乏味了，每日吟诵，都舍不得放下，何来坚持之难呢？

二是好书不厌百回读。《史记》是一本奇书，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费孝通回忆，少年始读此书，爱不释手，老师鼓励说“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于是，

这本书伴随了费孝通的一生。好书是要反复阅读的，毛泽东曾说《红楼梦》至少要读四遍，才会有发言权；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也指出，所谓经典就是人们不断重读的作品。费孝通用自己一生的阅读实践为后人做了榜样。

三是读书须读出自我。费孝通读《史记》觉得“文中有我”，此处的“我”，他年轻时觉得是作者本人，《史记》的文字里有司马迁的观点、态度和情感。经历数十年生活的磨砺，再读《史记》，费孝通惊觉，2000年前的司马迁怎么已写出了我连言语都无法表达的心态呢？他的感悟，也正是读书的真谛。

读书让人丰富阅历，生活的洗礼又让人更好地理解书中内涵，进而在书中读到自己。如此读书，才算真正读进去了，又读出来了。

吕思勉以猫为友

王剑

史学家吕思勉喜欢养猫。据他回忆，“九岁始好猫”，当时家里养的猫都是他的“猫友”。后来，他随父亲赴江浦县求学，特意带上猫作伴。在江浦县，吕思勉又新养了三只猫，加上原来那只猫，就是四位“猫友”，他分别为它们取名“志道”“据德”“依仁”与“游艺”。据悉，吕思勉一生中大约养过二三十只猫。

吕思勉爱猫几近痴迷。有一次，吕思勉路过常州东门外，看到养老堂东庑下卧着一只金黄色的猫，不由心生欢喜。堂中人原就讨厌这猫，见他盘桓不去，就说：“若真喜欢，就带走！”吕思勉大喜过望：“你把猫送到我家，我给钱二百。”那人果然高兴地送来了。还有一次，吕思勉与学生逛庙会，在宠物铺里看到一只白色卷毛波斯猫，但索价“稻米十石”。他望“猫”兴叹，“细细观赏了好一会才离去。”

吕思勉的夫人也爱猫。为了防止猫失足坠落，吕思勉把家中的水井都盖得严严实实。有人嗤笑他过虑，吕

思勉竟动用考据功夫，援引《辘耜录》，坐实古已有其事。吃饭时，猫爬上饭桌，把吕思勉筷上的菜打下来吃，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笑而已。

为了分享自己养猫的快乐，吕思勉写下《猫友纪》《太平畜》《猫教子》等随笔，认为“猫者，太平畜也，人爱其柔仁，与之为友，而无所利也”。他还为猫编撰专史，题曰《猫乘》，汇集了所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猫的掌故，例如《猫寿》《猫食》《猫相》《猫赛》等等。

上海“孤岛”时期，吕思勉以“野猫”为笔名，写下了《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系列文章，抒发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有一段时间，他常在信笺一角盖上他自刻的猫图案印章，“章似盈寸，造型简朴，苍劲如汉印”。

晚年，吕思勉每与常州来的乡亲谈完正事，总会问一句：“到我，见过阿黄吗？”当听说小黄猫“四日未归”，竟然犹忆成梦。1957年，吕思勉病逝。夫人在他的遗体边放了一支钢笔、一块表与一张猫的照片，与他洒泪而别。

沈从文“多管闲事”

游宇明

沈从文一向是个谦逊低调的人，一辈子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不跟人争抢什么，然而，沈从文一旦回归到老师身份，就本能地很“活跃”，他的一些举动甚至会给人一种“多管闲事”的感觉。

杨苡读西南联大的时候，跟沈从文做了邻居，她通过后窗就可以看到沈从文的住所。两人第一次相见，沈从文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声音很轻。他问了杨苡一些话，大致知道她情况之后便称赞、勉励了她一番：刚满19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大本大书，现在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还要好好读书，

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杨苡爱好很多，成天看小说、唱歌、写长信，要不就是在麻布上刺绣她想出来的花样。她还买了把乐锯，亮闪闪的，没事就吱吱呀呀地拉，幻想着能拉出动听的小夜曲。对杨苡的不够用功，沈从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有机会就劝诫。某天，杨苡特别懒散，早早吹熄了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盘算着第二天找谁去玩、到哪儿玩，是吃鸡米钱还是吃饵块……第二天一早，沈从文到外间工作，笑着问她：昨晚写了什么？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杨苡羞得无地自容。之前，沈从文就对杨苡说过：要用功哩！我去睡觉，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民国时代的女孩子普遍结婚、

生子较早，杨苡也不例外。杨苡结婚后搬离了跟沈从文同住的院子，住到很远的岗头村，沈从文曾专门去看她，一见面就拍着手说：“我来看‘狼狈的小母亲’了！”特地叮嘱她：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还是要做事。

沈从文不仅在思想上关心杨苡，在学业上更是用心提携。进西南联大之前，沈从文就已经是非常著名的作家，跟文坛人士多有交往。他知道杨苡喜欢文学，凡有作家、诗人来访，他就会叫她去见见。有个晚上，杨苡听到有清脆的女声喊“从文”，杨苡隔院看到沈从文的身影立起来，掌灯前往迎接，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像飘下来一般，原来是冰心来看他。院子里立即充满了欢声笑语，沈从文朝着窗户喊：“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杨苡立即下楼见到了冰心。几天之后有个月夜，诗人徐芳来访，沈从

文又是大声叫杨苡下楼，跟徐芳聊天。在沈从文看来，与文学名家的近距离接触，是提高写作能力的一种捷径，他希望给年轻的杨苡创造机会。

杨苡先前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并入西南联大后，她听从沈从文的建议，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而沈从文在国文系任教，确切地讲，杨苡算不上是沈从文的学生。无论是思想还是学习，其实沈从文都可以不去过问。然而，善良的沈从文却“好为人师”，时时刻刻关注着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这种父亲般的温情让杨苡记了一辈子。

杨苡直到暮年，对沈从文的生日和逝世日期都记得十分准确。关于他的事情，凡是自己所亲历的，不论发生在多久以前，都能将个中细节娓娓道来。杨苡去世前，还将沈从文、张兆和写给她的书信19通共31页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对待教书这个职业，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视其为饭碗，一是将它看成是奉献的平台。古人有所谓“经师”“人师”之说，前者学问可从，后者人格可风，只有将教书为饭碗者可以成为“经师”，视教书当作奉献平台者方可抵达“人师”之境。沈从文的“多管闲事”，体现的正是人师那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大情怀。